

从优先发展到科教兴国——邓小平、江泽民的教育观^{*}

李桂红

(上海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 上海 200234)

[摘要] 本文讨论了优先发展教育与科教兴国提出的历史背景及深刻内涵。指出从优先发展教育到科教兴国的转变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教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高度重视; 体现出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关键词] 优先发展教育; 科教兴国; 邓小平; 江泽民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874 (2007) 03-0010-03

改革开放以来,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面对当时国内外的各种挑战, 高度重视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在他们的治国方略中, 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民族的兴旺。优先发展教育和科教兴国是邓小平、江泽民两代中央领导集体教育思想的主旋律。

一、优先发展教育与科教兴国提出的背景

优先发展教育虽然是江泽民于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的, 但从它的形成和发展来说, 却要归功于邓小平。因此, 很多人都把优先发展教育看作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

邓小平一贯地重视教育, 早在一九七五年, 他就说, “我们有个危机, 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 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在新的时代面前, 邓小平一反文革的做法, 高度重视生产力的发展, 他认为社会主义阶段就是要发展生产力, 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发展生产力, 就要发展教育, 因为教育是为国民经济各行各业提供人才的。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发展需要的人才也是由教育提供的。文革结束后, 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初, 对于整个国家来说, 邓小平认为“战略重点, 一是农业, 二是能源和交通, 三是教育和科学”。1982年党的十二大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 把教育放在第三位, 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80年代初, 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为城市改革, 为教育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到了80年代中后期, 党中央已认识到,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 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时, 邓小平优先发展教育的思想已经呼之欲出。1992年, 党的十四大提出: “我们必须把

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努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 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标志着邓小平优先发展教育思想的形成。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规定: “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优先发展教育成为国家的法律。1997年, 党的十五大再一次强调: “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2002年, 党的十六大报告仍然提出“教育是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 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 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表明优先发展教育已成为全党的共识。

优先发展教育意味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到了一定程度后, 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全局中, 教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建国初期, 为了超英赶美, 为了像前苏联那样快速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 我国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优先发展重工业, 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为了积累重工业所需要的资金, 国家对整个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 以剪刀差的方式将农业剩余转移给工业, 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 造成农村经济的凋敝, 形成了目前的城乡二元经济的结构。发展重工业需要的是技术工人, 知识分子成为经济发展的边缘力量。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 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又被看作异己力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认为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就“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在邓小平看来, 知识分子不是经济建设的边缘力量, 而是中坚力量。在政治上, 是依靠力量而不是异己力量。

优先发展教育还因为教育在保持社会稳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邓小平多次强调, 中国不能乱, 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 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1986年邓小平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说: “实行开放政策必然会带来一些坏的东西, 影响我们的人民。要说有风险, 这是最大的风险。

* [收稿日期] 2006-11-24

[作者简介] 李桂红 (1973-), 女, 河南汝州人, 硕士, 上海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

我们用法律和教育这两个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有人不断地以改革的名义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提出了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主张。邓小平认为，要教育人民成为“四有”人民，教育干部成为“四有”干部。“四有”新人的教育思想，是邓小平对教育工作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也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要求。总之，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比较侧重发展生产力，但他的整体目标是“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

科教兴国是江泽民在1995年的全国科技大会上首次正式提出的。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重申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科教兴国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所选择的治国道路。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我国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世纪90年代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我们的经济体制要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轨，改革的过程充满了各种新的矛盾和挑战。我们不仅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要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同时将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市场，直到后来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经济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还有新技术革命的冲击，这个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末表现为知识经济的兴起。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更加剧烈的大背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全面分析国际国内发展的大势，“认为必须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加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体制的根本转变。这是全面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保证。”^[2]在科教兴国的战略中，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无论在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业人才方面，还是在提高创新能力和提供知识、技术创新成果方面，教育都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3]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纵观世界，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突出。科学技术越来越显示出第一生产力的巨大作用。我们必须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

二、从优先发展到科教兴国

优先发展教育目前已成为全党的共识，1995年的教育

法使其成为法定的国家发展战略。如果说优先发展教育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那么科教兴国则体现着党和人民对教育的厚望，体现着教育对国家和社会的巨大功用。从优先发展教育到科教兴国体现了国家对教育所具有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作用的重视，也体现了国家对教育创新及其引领国民经济发展作用的高度重视和依赖。邓小平优先发展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教育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国家要保证教育经费。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代表了党中央对于教育改革的共识：“发展教育事业不增加投资是不行的。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2006年6月29日修订的新义务教育法规定：九年义务教育不收学费、杂费。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予以保障。并规定了各级政府的责任，对于法律的执行情况，可以监督，可以问责。江泽民也强调“有远见的、成熟的、合格的领导，必然是重视教育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将教育纳入战略发展重点和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布局之中”为了保证教育的优先发展，江泽民认为“各级党政领导干部，都要抓好教育工作，坚持在制定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时保证教育优先的适度超前发展，坚持在安排各级财政预算时实现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宁可其他方面的事情放慢一点，也要提高教育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为教育优先发展提供物质保证。”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保证教师工资和学生人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国家发展教育除了财政经费之外，还要高度重视教育市场的作用。义务教育作为培养国民基本素质的教育，政府要真正承担起自己的义务。但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市场则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幼儿教育、高等教育、各种各样的培训等。目前我国已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更要高度重视教育市场的存在及其开放问题。世界贸易组织规定了实现教育服务贸易的四种方式，即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目前我国政府对境外消费完全放开，对跨境交付未做承诺，对自然人流动有限制，不允许外资以商业存在的方式在中国独立办学，只允许外资到中国进行中外合作办学，未承诺给予国民待遇。教育市场是在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运行的，在教育市场的开放方面，政府可以不承诺，但一旦做出承诺，就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运行，而不是按照政府一时的意愿。世界贸易组织可以形象地理解为政府的政府，裁判的裁判。我国人口众多，而教育经费有限，与其它产业的有效需求不足相比，人们对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需求旺盛。开放教

育市场可以使我们引进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引进国外资金,弥补教育经费不足;同时国外的办学体制和机制还能给我国的教育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但不利的一面同样存在,当外国把我国的学生、教师吸引走后,就会导致我国的资金外流、人才外流,当外国办学机构占领了我们的教育市场后,会影响我国对教育的控制,影响我国的教育主权。

国家要发展教育就要主动改革教育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进行了一系列教育体制改革。以高等教育为例,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高校的办学自主权作了明确规定,将能够下放的有关教学和人才培养的权力下放给了高校。1993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政府要转变职能,由对学校的直接行政管理,转变为运用立法、拨款、信息服务、政策指导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进行宏观管理。”1998年的《高等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规定:“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并具体规定了高等学校在招生、设置学科和专业、组织教学、开展科学研究、进行国际交流、设置组织机构、评聘教师和财产使用等方面的自主权。但法律规定的这些权力并没有完全实现。通过共建、调整、合并、合作的改革,我们改变了高校对政府的隶属关系。原先隶属于中央各部门的通过和地方政府共建,加强了地方政府的统筹管理权力,促使高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绝大多数中央业务部门的高校经过调整划归中央教育部门或地方政府管理,形成了中央与地方两级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新体制。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处理好之后,接下来就要处理好政府与学校的权力关系。

优先发展教育与科教兴国内涵丰富,不仅包涵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包涵着教育与国家稳定和兴旺发达的关系,因为教育对于一个国家的功能是多方面的。建国后我国曾提出过教育要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的方针,毛泽东也提出过“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1958年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需要教育,教育也应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的生产功能,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者就已认识到了受过教育的人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人力资本理论力图使人们相信,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教育并非只是消费,同时也是生产,是投资。

从优先发展教育到科教兴国体现了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教育工作的重视。体现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教育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体现出两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于教育的新认识。邓小平认为从长远来说,我国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如果一个领导人只顾抓经济,对于教育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或者仅在口头上承认教育的重要,那么这样的领导者是不成熟的领导者,无法领导现代化建设。江泽民认为国家要重视教育,教育工作也要创新,在思想观念、

体制、机制等方面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迎接新技术、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等的挑战,中华民族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国的教育如果要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就必须创新。

教育作用于经济发展,有两种形式,最基本的一种形式是通过培养人才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发展;另一种方式是以知识、技术为中介,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体现出教育与经济发展在更高的层次上更紧密的结合。如果说第一种方式是指整个教育活动,那么第二种方式则主要是指高等教育。高等教育不仅具有培养人才的功能,还有发展科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通过知识和技术的创新,高等教育可以直接参与经济活动。江泽民认为“我们的大学应该成为科教兴国的强大生力军。教育应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各类人才支持改革和知识贡献。这是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4]1998年5月4日,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5]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科教兴国的战略,教育部实施了“985”工程,重点支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等学校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从此开始了我国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工程。2001年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九十周年大会上,江泽民说,“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开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离开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6]

如今,通过培养人才促进经济发展,对教育活动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正如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科学城会见科技界人士时的讲话时说,“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的关键在人才,人才的成长靠教育。教育水平提高了,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才有后劲。”对于中美之间教育的区别,有人认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比较扎实,比美国的好,而美国的高等教育则比中国的好,认为中国的教育是赢在起点,而输在终点。其实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不能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如果我们在中小学给学生的是填鸭式的教育,学生掌握较多的是知识,那么这样扎实的基础教育,本身就包含着天生的弱点。在创新精神的培养方面,“每一个学校,都要爱护和培养学生的的好奇心、求知欲,帮助学生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保护学生的探索精神、创新思维,营造崇尚真知、追求真理的氛围,为学生的禀赋和潜能的充分开发创造一种宽松的环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转变那种妨碍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发展的教育(下转第24页)

对应付差事的单位要视情追究单位领导责任,防止滥竽充数。

借助部队优势,形成管理合力。对短期培训干部学员约束力不强是导致培训管理工作难度人的重要因素。短期培训队的干部学员从部队来到院校,由一名部队干部成为一名院校普通学员,身份发生了变化,但他们的“根子”还在部队,加之培训时间较短,不容易形成学员对院校的认可感和归属感。因此,一方面要注重教育引导,帮助他们树立大局观念,消除模糊认识;另一方面,要注重借助和发挥部队的管控优势,提高管理效果。建立院校与部队的沟通渠道,及时通报情况、反馈信息,增强对学员的约束力,加大管控力度。院校建立与部队共育共管网络,定期互通信息,部队及时将学员入校前的详细情况通报给院校;院校定期把学员表现情况通报原部队,请部队配合管理。建立健全约束机制和奖惩机制,严格按条令和院校、部队双重奖励,对问题突出的学员可视情退回原部队。建立抓学习的各项责任制度,实行系抓教研室、队抓学员的教学管理责任制。系领导负责上课前对每个任课教员从教学内容到方法、手段进行逐项审查把关,达不到要求的教员不能上讲台。任课教员课后尽量多给学员布置研讨课题,规定完成时限,有意给学员压担子,让学员业余时间有事可干。

队干部要做到“三个跟得上”,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一要跟得上教学任务的变化。短期培训班的学制长则六个月,短则十几天,班与班之间教学任务不衔接、不连贯,各班次不但任务不同,而且学员的年龄、级别、工作阅历、生活习惯也都各不相同,各班次的教学任务、特点、规律也都不一样。这些情况都要求队干部必须及早进入情况,尽

快熟悉和掌握学员的各种情况,及时明确工作思路。二要跟得上不同班次的变化。即使是相同的专业,但由于培训对象个体的差异和教学任务的转变,也会对学员队的工作提出不同要求,这些都要求学员队干部在教育和帮助学员实现(完成)转变的同时,也要完成自身的转变,跟得上短期培训班“短、频、快”的工作节奏。三要跟得上学员的思想变化。不同时间入学,不同单位入学的学员,其思想状况,关注的焦点是有很大差异的,队干部必须在摸准底数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开展,跟上学员的思想变化情况,及时做好学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总之,通过借助外力、激发动力、形成合力,促成部队和院校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方能达到提高短期干部培训质量之目的。

四、结束语

随着全军人才战略工程的加速推进,在任职教育的进程中,短期干部培训将是院校教育的主体。如何提高短期干部培训质量,将是院校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臧,史文辉.短期干部培训管理难分析[J].中国军事教育,2002,(5).
- [2] 中国人民解放军汽车管理学院.优秀论文汇编[C].2004.
- [3] 耿仕信,潘玉田.关于岗位任职教育几个问题的探讨[J].中国军事教育,2004,(1).

(责任编辑:胡志刚)

(上接第12页)

观念、教育模式,特别是由教师单向灌输知识,以考试分数作为衡量教育成果的唯一标准,以及过于划一呆板的教育教学制度。”^[7]

“教育同经济、科技、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结合,正在成为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教育作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不仅要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人才和智力储备,而且要直接参与各方面的建设事业,为推动各项建设事业作出贡献。这就要求必须改革脱离社会实际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模式,通过经济体制、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尽快建立教育与经济、科技密切结合的新机制。”^[8]江泽民认为“象牙塔”式的教育,不能适应当今时代的需要。学校教育要走出“象牙塔”,“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子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青少年参加社会实践,是为了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是为了获得真正的知识,促进学生能力的发展。21世纪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更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如果说过去国际军事政治斗争的背后,主要表现为直接争夺工业化必需的资源 and 商品、

资本输出的市场,那么,当今的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越来越围绕人才和知识的竞争展开。发展的优势蕴藏于知识和科技之中,社会财富日益向拥有知识和科技优势的国家和地区聚集,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9]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08.
- [2][3][7][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877,878,881,882-883.
- [4][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26-327,327.
- [6][9]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94.

(责任编辑:范玉芳)